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中国与达尔文

[美] 浦嘉珉 著 钟永强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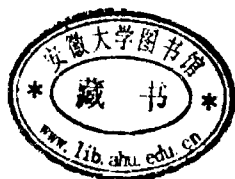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中国与达尔文

[美] 浦嘉珉 著 钟永强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达尔文/[美]浦嘉珉著;钟永强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4936-0

I. 中... II. ①浦... ②钟... III. 达尔文学说-影响-
中国-研究 IV. Q1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6744 号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By James Reeve Pusey,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83. Copyright © 198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159

书 名	中国与达尔文
著 者	[美]浦嘉珉
译 者	钟永强
责任编辑	戴宁宁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 304mm 1/32
印 张	16.375 插页 4
字 数	42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936-0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鳳凰文庫
PHOENIX LIBRARY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 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 强 汪 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谭 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 员 刘健屏 黎 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 锋
余江涛 吴 迪 吴 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王保顶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译者的话

美国学者浦嘉珉 (James Reeve Pusey) 的这本《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1983) 前后写作花费了 13 年时间, 其最初的形态是作者在 1976 年完成的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浦嘉珉在哈佛师从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教授和史华兹 (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 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从《中国与达尔文》的切入角度及其问题意识, 我们很容易在里面发现史华兹的名著《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的深刻影响。史华兹的著作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 探讨了严复翻译的著作与原著的意义“偏离”, 以及这种“偏离”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而浦嘉珉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关于文本翻译与解读之间的思辨张力, 把“个案分析”扩展至中国近代思想谱系的研究当中, 其中主要评述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炳麟、吴稚晖、胡适等人, 而与这些中国近代思想家进行对比研究的西方思想家则有赫胥黎、斯宾塞、顿德、克鲁泡特金等等。由于评述的人物众多, 引用的资料庞杂, 所以该书在结构上显得有些“松散”, 如果读者首先阅读此书的结语部分, 那将会对作者的

行文框架有更好的理解,因为浦嘉珉在结语中提出了一个始终贯穿全书的总问题:“在使中国适应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些什么?”

《中国与达尔文》可以说是西方学者比较详尽地研究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及其影响的重要著作。浦嘉珉的著作虽然只是集中讨论达尔文学说与近代中国的关联,以及达尔文学说对维新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但他同时将中国的“儒、道、释”传统引入研究之中,而且书中引证了大量原始文献资料,无论这些引证是否全面,但它至少表明研究的深入和广博。浦嘉珉试图指出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许多重要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和“误读”,指出它们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之中成为不证自明的“法则”,以及这种法则在过去与未来的两大维度之间如何构成一种救赎的过渡,或者换句话说,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如何将中国思想的传统因素加工成未来的革命质料(显然,因为写作年代的限制,浦嘉珉的最终指向是“文化大革命”)。浦嘉珉试图在这场由不同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共同推动的革命之中发掘出传统因素,以及这些传统因素如何与“异质的”的达尔文进化学说配合得天衣无缝。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论哪一派的达尔文主义者或准达尔文主义者都有着难以规避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进化与伦理/道德的两难困境。浦嘉珉后来在另一部著作《鲁迅与进化论》(*Lu Xun and Evolution*, 1998)里继续了他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进化与伦理悖论的思考。

当然,《中国与达尔文》更多地是在社会政治层面探讨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它展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使中国“适应”或“摆脱”那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而进行的努力。而美国学者施奈德(Laurence Schneider)最近出版的著作《20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03)

则可以作为《中国与达尔文》一书相当有益的补充阅读。施氏的著作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了生物学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生物学家正是不断地致力于将科学从中国的唯科学主义中区别开来,特别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哲学的垄断中争夺中国的遗传与进化话语。

《中国与达尔文》的英文原著自1983年出版以来,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出版物的“生存竞争”,仍然展现出很强的生命力,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毕竟,人类(或社会)的进化问题依然是吸引人的话题,正如“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的问题那样富有魅力。作者在此书的末句说过:“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是,没有人知道怎样去理解进化。”无论你是否同意作者的主要观点,但这句话仍然值得深思。至于书中的一些观点也许与我国的主流语境不尽一致,考虑到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翻译时尽量保持了原貌。希望读者能以学术的态度加以辨别。

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首先要感谢刘东老师,感谢他对我信任以及给我提供的尝试机会;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府建明编审,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关心和谅解;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戴宁宁女士,她的细致和认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中国与达尔文》原书引用了不少港台地区的文献,有些文献资料在大陆没有找到,翻译时主要参照了现在的通行本。同时,书中的一些术语在翻译时附上原外文,以便读者查对。由于译者的外语水平和学识有限,讹误纰漏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钟永强

献给我的父母

安妮·普西和内森·普西

献给我的岳母

王陈婉

以及献给我的岳父

王德昭

致 谢

那篇使本书得以形成的博士论文花费了七年时间——或长或短，一段漫长的时间。而我应该感激我的论文导师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我对他们的感谢不止于七年来的忠告、激励、帮助和友谊。比起其他著作，史华兹教授的著作更能激起我对此论题的兴趣。费正清教授阅读手稿的效率惊人，而且不断发来信函鼓励我坚持下去。

不知不觉，六年多的光阴悄然逝去，而曾经帮助我最终完成此书的人们的名单已经不断延长。但在那份名单的最前面肯定有我的岳父，唉，刚刚去世的王德昭教授。他在中国香港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研究；他此后继续给我提供帮助、寄送材料、解答疑问，并且解决了困扰我的脚注难题。他阅读了那篇论文，我真希望自己当时能够加紧时间写作，以便可以尽快把此书寄送给他。

我同样万分感激我的岳母，感谢在香港的那些精彩的岁月，感谢她从那时以来所给予的慷慨帮助：寄送书籍（以及家庭包裹）。我的姑父，王子良（音，Wang Tzu-liang）先生，他也从台北给我寄来非常有用的书籍。

我应该特别感谢尼古拉斯·克利福德(Nicholas R. Clifford)教授和余英时教授,要感谢的事情比我在这里所列举的要多得多。我知道自己没有设法遵循他们的建议,所以我希望最诚挚地说,不是他们、也不是我的岳父以及其他任何人,而是我本人应该为这部著作里的任何过失或疏忽而受指责。尤其是没有人应该为我的结论而受指责。

我要感谢明德中文学校(Middlebury Chinese School)的两位主任,T. T. 陈教授和林贺兰(音,Helen Lin)教授,他们让我在此执教期间可以继续撰写我的论文或著作;我要感谢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教授和郭正昭(Kuo Cheng-chao)教授,感谢王子纯(音,Wang Tzu-ch'un)先生和胡嘉阳(音,Hu Chia-yang)女士。

我同样始终对四名无畏的打字员深怀感激,她们是埃尔诺·布赖恩特(Elinor Bryant)、埃塞尔·哈特曼(Ethel Hartman)、玛格丽特·马克斯(Margaret Marx)以及我的妻子;我要感谢三位非凡的通信读者(courriers extraordinaires),杰罗姆·科恩(Jerome A. Cohen)、斯蒂芬·奥林斯(Stephen A. Orleans)以及贺诗礼(Jamie Horsley);还有一位书法家,黛安娜·王(Diana Wang)。

读者应该和我一同感谢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Katherine Frost Bruner),她制作了一份了不起的索引。因为,经过一天的尝试,我对自己准备一份索引深感绝望,以致我打算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众心之王(King of Hearts)对大白兔讲的一番话作为我本人的绵薄之助献给读者:“从开始的地方开始,接着一口气念到结束为止,然后停下来。”实际上,那依然是我的“最佳建议”,但我还是要感谢布鲁纳女士,她凭着如此果断的技巧,使得查阅本书成为可能。

这里还有一位本书的制作者,我应该对他表示更大的感谢,那就是我的编辑,我对他的博学、耐心、优雅的格调、勇气和出色的见解无限钦佩。我是个患有编辑恐惧症的人,在这场斗争开始的时候,我担心所有编辑都会使我的意思走样。但我已经被治愈了。我现在相信没有什么

能比拥有一名像弗洛伦斯·特雷费森(Florence Trefethen)那样的编辑对于作者来说是更大的幸福了。

许多机构也向我提供了帮助: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学院、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哈佛-燕京图书馆,当然,还有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民众)帮助我学习汉语,完成研究生的学业,以及提供两年的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和四年的国防外语奖学金(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s)支助我从事研究。通过系主任利昂·帕卡拉(Leon Pacala)和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H. Chambers)、教务长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 I. Smith)以及副校长弗朗西丝·弗格森(Frances D. Fergusson)的帮助,巴克纳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慷慨地减免了我两个学期的教学负担,并资助我相当高昂的打印、影印之类的费用。

我最后要带着歉意感谢所有的同事和亲友,他们关心我、期待我、祝愿我,尽管这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在这些年来还是一直向我致予成功的祝福,因为他们知道,唉,我认为分享写作的艰苦更易于分享写作的愉悦。因此,我要感谢我的哥哥、姐姐、姐夫和两个最大的侄女(我希望年幼的侄女和侄子对这些都不在意)以及我的良朋好友,那些令人舒心的相聚时刻没有因为我的写作而耽搁。

出于同样的原因,出于我无法一一列举的其他事情,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最后,我要感谢其方,她给予我的帮助尤其多,日复一日,方方面面,她肯定因为此书而苦不堪言,但她总是庆贺此书在地质学上缓慢发展——或进化的每一步。

我们一起感谢小松和小兰吧。

13年了,但我们已经完成任务。

谢天谢地。

目 录

译者的话 1

献词 1

致谢 1

上编:预警——达尔文进入中国 1

前言:小猎犬号在中国海 3

第一章 进步 9

一、西方的“证据” 10

二、康有为的儒教进步观 15

三、《春秋》的进步观 28

第二章 达尔文登场 48

一、原强? 49

二、请教达尔文 57

三、当心,但要有信心 73

中编:达尔文拥护改革 79

第三章 达尔文与中国的进步 81

一、梁启超、报刊与进化论 82

二、变或被变 89